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六三期 ——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8c)

【沧桑纪事】	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三)	陈小津
【百家争鸣】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一些不同意见	高原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 (十八)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沧桑纪事】

我的文革岁月 (节选三)

• 陈小津 •

◇ “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

我父亲和胡耀邦、谭启龙、黄知真等是红军时期有名的“红小鬼”，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都这样称呼的。如果把“红小鬼”变成“黑小鬼”，那就从根本上判处了陈丕显在政治上的死刑。他们还真从我父亲几十年的档案中找到了1930年我父亲被捕的经历。江青知道后大喜过望，马上用她特有的形象思维推理，被捕而没牺牲，那只有投敌叛变啊，马上信口雌黄地公诸于世。为了落实我父亲是“黑小鬼”的罪名，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召集“陈丕显专案组”、《解放日报》社和市委办公厅造反派组成联合调查组，共有十余人前往我的家乡闽西调查此事。李文静指示：“重点调查1930年被俘一事，这是关键。”那么，被李文静们如此看重的所谓“陈丕显30年代历史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0年6月，红军主力从福建长汀开往长沙。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向长汀疯狂反扑，留守的长汀县苏维埃机关被迫向上杭一带转移疏散。当时，刚满14岁的父亲任县宣传队分队长，转移途中病倒了。7月2日，父亲和一批红军伤病员分乘两条船顺汀江南下转移。当船行至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村时，遭到当地地主“民团”武装的伏击。船上的人纷纷跳水，有的牺牲，有

的突围出去，父亲及十余个红军伤病员被俘。

由于这两条船上的红军伤病员都是临时凑在一起的，大家相互间并不认识，敌人也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有一位同志在敌人搜查时大胆逃脱，但跑出两里路后被抓住，因他身上带有身份证明，暴露了身份，被敌人当场杀害。三十多年后，父亲从专案组人员的嘴里，才知道这位牺牲的同志是红军的一个大队长，叫涂应达。

父亲当时没有暴露身份，因年纪小、个子小，敌人把他当成“红军小孩”，交给一个姓刘的农民家里看管。父亲在他们家里住了十几天，每天帮助他家劈柴、烧火，这家人很喜欢和同情我父亲。姓刘的老乡告诉父亲，听乡里人传言，民团头子看中了他这个“红军小孩”，想收为义子，但又嫌他年龄太大了一点，怕养着不亲，正犹豫着。一天，民团开去打长汀了，这家老乡就用船悄悄送父亲过江，还给了一点钱，要他赶快回家。父亲上岸后，跑了四五里地，终于在河田镇找到了红军队伍。

这种事情在战争年代，尤其在敌强我弱的红军时期是经常发生的。“文革”前，我父亲把自己的这段难忘的经历以及那个民团头子想收他为“义子”当成革命故事，在不同场合多次讲给我们这些青年人及身边工作人员听，目的是帮助我们了解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历史，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而且，对于这段经历，父亲在干部登记表上填写过，组织上也审查过，本来是一清二楚的。可“四人帮”及其爪牙为实现其不告人的政治目的，硬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不遗余力地编造历史。在“文革”中，救过我父亲的这户刘姓人家，竟被诬蔑为“恶霸地主”、“民团团团长”，受到了迫害。

这段历史实在是太清楚了，连一点可以编造的余地都没有。1967年10月，专案办的调查人员只得向张春桥汇报说，陈丕显1930年被捕过，当时只有十四岁，穿便衣，是和伤病员一起被捕的，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发现叛变自首行为。

不可能，江青同志都宣布了，怎么不叛变？张春桥听了十分恼怒，重新调整了专案人员，要他们再赴闽西调查。从1967年至1972年，一批又一批调查组连续在闽西调查了五年之久，派出的人员多达20多批、990多人次。他们先后到过闽西的龙岩、长汀、上杭、清流、宁化和江西赣南地区的16个县的32个公社，调查了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调查组所到之处，总是先要用大喇叭、大字报、大标语大肆鼓噪一番，说“陈丕显是老反革命、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制造恐怖的高压态势，接着，要召开群众批判大会，揭发批判所谓的陈丕显“三反”罪行、“叛变投敌”历史，要大家与陈丕显划清界线。然后，再把熟悉我父亲或我父亲共过事的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逼他们揭发陈丕显的历史问题。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对其中的一些知情者，他们采取了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和威胁、辱骂、捆绑殴打等法西斯的手段逼供材料，甚至不惜动用专政工具逼迫原伪职人员出具伪证。为了向“四人帮”交差、请赏，他们为此在闽西制造了很多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数以百计的干部、群众及我父亲的亲属受到株连，有人被迫害致死。

调查组先后十几次纠缠一位叫张德胜的老红军，采取捆绑、关押、拳打脚踢、罚跪、手枪威吓等下流手段，逼其揭发所谓“陈丕显曾在长汀出卖革命同志，打死伤员一名”等问题。这位当时70岁高龄的老红军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捏造的材料，说：“要我捏造事实，陷害陈丕显同志，说他在蔡场打死伤兵，叛变革命，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就是枪毙我全家四口，我也不说。”最后，这位老红军受不了这些外调人员的折磨与迫害，含冤自杀身亡。调查组的种种卑劣行径激起了闽西干部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证明我父亲历史清白，没有叛变投敌。

在他们污蔑我父亲的诸多政治问题中，所谓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也是他们看重的一枚“重磅炸弹”。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制造的诸多冤假错案中，以此案最为骇人听闻，受株连的人多达数百人。直到我父亲1974年11月获得“解放”出来，张春桥等人仍死咬不放，成为继续攻击我父亲的“悬案”。

实际上，所谓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纯属子虚乌有。1965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遭人诬陷，说他对毛主席搞过窃听。中央决定由彭真主持查清此案，抽调大量专家和公安人员，对毛主席在北京和上海等地住处全面检查。上海市委指派分管政法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梁国斌负责此事，市公安局也全力配合公安部的检查。结果，上海没有查出任何窃听装置。我父亲和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上签了字。“文革”中，张春桥一伙为了攻击彭真包庇杨尚昆，彻底打倒我父亲和市委其他领导，并借机清除和打击公安队伍中的异己势力，居然旧案重提，根据一些人无中生有的揭发大做文章，制造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案件。他们指控我父亲是主谋，牵涉的人也越搞越多，先后有300多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打伤、致残，有的人被逼自杀。

“外调”没结果，就要口供。张春桥、王维国、王少庸等加紧了对我父亲的批斗、审讯，企图从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定罪根据。从1967年5月至1972年12月，我父亲经受的大小批斗会和审讯有数百次之多。专案组人员明知我父亲身患肿瘤疾病，体质虚弱，却千方百计地变着法折磨和摧残他，大声辱骂，拍桌子瞪眼睛，罚站……最残忍的是搞“车轮战”、“蘑菇战”，接连几天提审，一两个月不间断地批判。在我父亲被专案组押到奉贤“五七”干校搞所谓“田头批斗”期间，他一天要被批斗几场，白天稍有空隙就被逼迫扫猪舍、挑猪粪，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每天只让睡三四个小时。不要说像我父亲得过重病的人，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也受不了这种折磨。尤其是1972年4月，已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高位的王洪文，见“陈丕显专案”迟迟几年不能定案，就亲自召集专案办和专案组人员开会，说此案不能再拖了，要求上半年结案。于是，在从5月9日到7月5日的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我父亲连续遭到了68次批斗、审讯。专案组每天只准我父亲睡三四个小时觉，企图从肉体和精神上把我父亲整垮，在神经错乱中交出他们迫切需要的所谓材料。对于专案组里的某些人来说，一说要批斗我父亲、迫害我父亲，似乎成了一种乐趣。人性会扭曲到这种程度，是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但是，我父亲也让“四人帮”及其爪牙们见识了“红小鬼”的硬骨头！父亲把每一次审讯都看成是为维护真理、为维护共产党员光辉形象而战。专案组要我父亲交代1930年被捕的问题，父亲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你们说我1930年有罪，那是你们欺骗毛主席，欺骗群众。”他们说：“陈丕显，你的历史问题经过几年的调查，情况已经查实。”父亲说：“我有什么罪，你们拿出证据来。既然已经查实，你何必还问我呢？”他们说我父亲不老实，父亲就说：“你们搞的是假案子，是逼供信。你们才不老实。”，“我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我要对党负责。没有的事，硬逼我，我不能讲！我这也是用的毛泽东思想”。他们诬蔑父亲是“老反革命”，是“叛徒”，父亲严正声明：“我三〇年没有罪，是光荣的历史。你们这样迫害我才是反革命，是叛徒。”“你们搞的证据都是假的。我要组织上给我讲清楚。”他们大声吼叫，父亲也提高嗓门，毫不示弱。有时，父亲被斗得筋疲力尽，就不吭声，保持沉默。我父亲被囚禁八年，专案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都对他无可奈何。

关于“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专案人员对我父亲进行“重点突破”，使尽各种阴谋诡计进行诱供和逼供。1970年3月4日至13日，在9天之内诱逼他16次。但是，我父亲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据理斗争。1972年，我父亲含着热泪专门给周总理写过一封信，指出他们搞的所谓“侦控案件”完全是一个冤案，要求党中央过问这件事。信是通过专案组上交转呈的，估计此信因揭露了他们逼供的情况，被张春桥、王洪文扣下了。

1975年，专案办最后一次就我父亲的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这份材料上报前，由于关于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主要证据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根本站不住脚，最后只好从原稿中抽掉。“四人帮”一伙为了置我父亲于死地，费尽心机折腾了八年之久，最后一无所获。

◇ 岁寒识松柏

上海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是江青一伙猖狂夺权、祸国殃民的重灾区。尤其“一月风暴”发生后，一大批干部、群众被诬蔑陷害，上海从此陷入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陈老总生前赋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与丑恶势力的激烈对峙中，除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少数变节分子卖身投靠外，以我父亲、曹荻秋为首，包括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杨士法、张祺、黄赤波、秦昆、李研吾、李干成、宋季文、石英、宋日昌、张承宗、金仲华、赵祖康等在内的十几位市委书记、常委、市长、副市长全部遭到了张春桥一伙的残酷迫害，多数人身陷囹圄长达数年。有的领导，如曹荻秋、石英、金仲华等，被迫害致死。但他们始终不惧淫威，傲霜斗雪，宁折不弯，共同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之歌。

在上海老一辈中，一提起“陈、曹、魏、杨”，经历过“文革”的上海人大都不会陌生。“文革”一开始，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这四位父辈同时被抛到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同时被打成“上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的代理人”，同时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两报一刊”在全国点名批判……

当时，各省、市、自治区被全国“两报一刊”点名“打倒”的领导一般只有一位，很少有两位，而上海一下子就揪出了四位，很耐人寻味。陈、曹、魏三位被打倒似乎还可以理解，我父亲是市委第一书记，又是党内知名的红小鬼，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极具威望；曹荻秋是市长，在我父亲养病的情况下代理主持市委领导工作，从运动一开始就千方百计与各种动乱行为作斗争，毫不妥协；魏文伯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被诬为刘少奇、邓小平在华东地区的代理人。可杨西光时任市委候补书记，在市委领导班子中排名很靠后，为什么也榜上有名呢？后来经过查证，原来与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风暴”前喊出的“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口号有关。据说这个口号经由张春桥一伙汇报到毛泽东那里，还得到他的称赞，由于“钦定”，杨西光由此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在“文革”中被“两报一刊”点名打倒的省市级候补书记。

在1967年1月刮起的夺权“风暴”中，“陈、曹、魏、杨”等上海市、华东局主要领导经历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我记得在1月14日的批斗中，曹荻秋伯伯被造反派强制跪在一辆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高架车上，反剪双臂，脖子上挂着木牌，在南京路等繁华闹市区游街示众。且不要说这样很危险，就是这种充满人身侮辱的作法，也只有变态狂希特勒干得出来！

“陈、曹、魏、杨”四位父辈一同被关押在康平路71号的一栋小楼里“隔离审查”。那栋小楼本是荣毅仁的家，“文革”中被没收了。“陈、曹、魏、杨”每人分别有一个专案组，每人单独关押在一间房里，单独放风。为了彻底打倒这四个“旧市委”的老领导，张春桥一伙抓住他们在革命生涯中都有过被捕的经历，蓄意给他们强加了同样的罪名：“叛徒”。各专案组以此展开了长达几年的所谓调查取证工作。其实，“陈、曹、魏、杨”四位父辈的政治历史问题，早已被中央审查过，没有任何污点，清清白白。他们有过的或多或少的被捕经历，恰恰是他们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大义凛然、英勇斗争的光荣史。

曹荻秋伯伯和我父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了。那时曹伯伯是苏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

任，我父亲是苏中区党委书记，两人经常有工作上的联系。后来组建华东工委时，我父亲任工委书记，他任副书记，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工作配合得也很好。1952年起，两位父辈一直在上海市委、市人委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曹荻秋被诬陷为“大叛徒”是因为他1932年曾在上海被捕过。曹荻秋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四川领导了震惊全省的“广汉起义”，1931年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后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2年3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在敌人审讯时，他说自己叫张云清，从乡下来找一个老乡谋个差事，因走错了路、找错了人家才被抓了来。后虽经多次审讯，并有叛徒指认，曹荻秋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曹荻秋的这次被捕问题，中央在1957年10月的“肃反审干”运动中就已经作出明确结论，认为“曹荻秋同志在被捕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国民党当年留下的关于曹荻秋从被捕、审讯到判刑的档案中，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曹荻秋五年刑期届满时“未肯将过去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谕，未有表示”。正因为如此，曹荻秋又被国民党押至苏州的江苏反省院关押。抗日战争暴发后，曹荻秋组织在押的政治犯开展绝食斗争，并作为大家推举的三位代表之一要求国民党无条件释放在押的政治犯。经过与敌交涉，以及周恩来总理的营救，在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的大背景下，曹荻秋与难友在1937年8月下旬全部被释放。

为了蓄意陷害曹荻秋为“叛徒”，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之流根本不顾历史事实，指挥“曹荻秋专案组”跑遍全国，甚至采取诱供、逼供、制造假材料等手段，不遗余力地调查取证。与我父亲一样，曹荻秋在关押期间也遭到了“车轮战”、“蘑菇战”式的审讯。但是，他坚决抗争到底，决不接受叛徒的罪名。一次审讯中，他拍着桌子对专案组人员说：“我是共产党员，谁也不能污蔑我！”

几年下来，他们在曹荻秋伯伯身上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任何“罪证”。在1972年7月26日王洪文主持的市委常委会上，“曹荻秋专案组”提出了“根据外调材料，曹定叛徒证据不足，定不上叛徒”的意见。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黄涛等立即训斥专案组“严重右倾”，说什么“曹荻秋定不上叛徒，还有谁能定叛徒”、“曹荻秋的问题否定了，我们就被否定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

1973年2月，“四人帮”及其党羽被迫决定解除对曹荻秋的所谓监护，5月把他送到奉贤的市直机关“五七”干校监督劳动。9月，他们炮制的《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报中央。曹荻秋再次严正表明态度：“按照政策，我定不上叛徒，如果市里定了，我要向中央申诉。”他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写信，申诉冤情，但不仅这些信都遭到无理扣押，他本人还背上了“翻案”的罪名，继续受到迫害。后来中央没批这个报告，此事不了了之。1975年秋，“四人帮”及其党羽再次正式向中央提交关于曹荻秋的定案问题的报告，狡诈地说什么“是否要定为叛徒？党的组织生活是否予以恢复？我们还吃不准”，“请中央来决定”。马天水、王少庸暗地里对赴京汇报的“专案办”人员讲：“中组部若问上海的意见，就说市委倾向定上。”

1976年3月29日，身心交瘁的曹荻秋伯伯突发心脏病，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含恨辞世，未能熬到“四害”被一举铲除的历史时刻。曹伯伯含冤去世后，我父亲内心里常为此感到十分难过。父亲感到曹伯伯在“文革”经受的苦难，有很大一部分是代他受过的。值得欣慰的是，1978年4月，中央批复上海市委的专题报告，为曹荻秋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如果仅以是否被捕过、被捕次数多少来圈定一个人是不是叛徒，魏文伯是最能引起“四人帮”的兴趣，因为他曾四次进过国民党的监狱。

魏文伯是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狱中上过敌人的老虎凳，灌过辣椒水，还在东北军中当过“地下党”。解放初，他任华东局秘书长兼上海市委秘书长，后调北京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等职。从1955年起，魏文伯调回上海，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后又相继担任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组长。因他领导有方，到1958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有15县（市）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记者的实地采访报道后，激动得夜不能寐，气势磅礴地写下了《送瘟神》的著名诗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1961年，魏文伯重回华东局工作，任华东局候补书记、秘书长、书记。

“文革”开始后，华东地区尤其上海地区日趋混乱。魏文伯挺身而出，于1966年八九月间连续三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紧急电报，呼吁立即停止红卫兵大串连，控制各地的混乱局面，保证工农业的正常生产……可是，魏文伯的直言相谏不仅没有引起中央重视，反而因此接到了北京的通知，要他就“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作检查。“安亭事件”后，魏文伯面对更加猖狂的黑风浊浪，多次在机关某些会议上忧愤地说：“‘文革’是乱搞，不乱到家不算完。才吃了两年饱饭，再挨饿就知道错了。”“‘文革’这样搞法，总有一天要被清算的。看将来还有没有文章，如果就这样完了，没有另外文章了，是不能服人的，将来一定要算账。”“我书记不干，也要提意见。”“中央文革一些人不懂生产、不管生产，都是些秀才，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上海“一月风暴”后，魏文伯落入造反派手中，多次遭到揪斗，同时被解除一切职务。不久，他与我父亲等一起被监禁在康平路71号。“魏文伯专案组”成立后，张春桥对专案组长说：“魏文伯是叛徒，要抓紧清查。”“魏文伯专案组”为了逼迫魏文伯承认自己是“叛徒”，经常两三天连续审问他，不许他睡觉，也不让他吃饱饭。1968年10月，魏文伯作了一首小诗《遣怀》抒发心声：“饥饿思饭好，疲劳知床亲。岁寒识松柏，贫困见人心。”

专案组人员反反复复地要魏文伯交待几次被捕及“叛变”的情况。可魏文伯先后写了几百遍，都是同样的内容。专案组人员为了达到目的，甚至还丧心病狂地采取非人道的审讯手段。他们明知道魏文伯心脏不好，却故意用橡皮胶带把魏文伯的嘴巴、鼻子封住，只留一点点透气的小孔。1968年3月，专案组人员为了逼他承认1930年第二次被捕时出卖过同志，连续两天两夜批斗和审讯。到第三天晚上，魏文伯病倒了，头昏，发冷，四肢发抖，可专案人员仍不放过他，叫医生在旁边观察，继续审讯。后因魏文伯被折磨得出现抽痉现象，医生说有脑溢血的危险，才被送到医院急救。1969年12月，专案组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所谓“对敌斗争经验”的启发下，又对魏文伯发起了一个11个半天和一个晚上的连续审讯攻势，直到折磨得他精神恍惚，神志不清。

无论专案组使出什么样的手段，魏文伯始终拒不认罪。1968年11月，他以一首《自励》激励自己：“幽居久病唤如何？人到白头阅历多。年老心红犹未晚，随时努力莫蹉跎。”他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有解决，几个跳梁小丑横行霸道的时代终将结束。“花落花开自有期，上台终有下台时。长途跋涉防迷路，一举一言仔细思。”

1973年3月29日，魏文伯与曹荻秋同时获释回家，但仍无行动自由。魏文伯以诗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大厦忽倾垂，双燕声叫危。望到清明日，重见燕飞回。”这位老人就是这样永不放弃希望，当专案组在最后上报中央的结论中认定他“在北平四次被捕，其中三次叛变，后来又公开发表反共文章，罪行极其严重。……戴上叛徒帽子，永远开除出党”。魏文伯表示强烈抗议，先后三次给市委写信，并请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强加的叛徒罪名予以坚决驳斥。张春桥对此大为恼火，恶狠狠地批示：“专案组可以再同他谈一次，驳回他的翻案，他的

信可以存专案组，不必干扰中央。”魏文伯是压不垮的。他以居所前一棵巍然挺立的高大雪松自喻，自号“老松”，以示自己不屈不挠反抗“四人帮”的决心。

杨西光也被张春桥一伙扣上了“叛徒”的大帽子。他1933年在上海大公职业学校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春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时，暴露了身份，被校方开除，之后在南京、芜湖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到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于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杨西光在东北军中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在抗日大后方重庆从事过团结抗日的宣传活动。解放前后，他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日报总编辑，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建省委委员等职。杨西光于1954年9月调回上海，之后的十年间历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等职。“文革”初期，杨西光在市委分管教育工作，又兼任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所以，当“红卫兵运动”蔓延到上海时，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市委领导里最先受到批斗冲击的对象，多次惨遭他所呕心沥血培育的学子们的殴打。

“一月风暴”后，造反派抓住杨西光在1934年被职业学校开除一事，处心积虑锻造冤案。张春桥别有用心地散布谣言，说那个学校的校长是国民党的什么委员，发现了共产党决不会轻轻放过。就凭张春桥的胡说八道，上海市专案办就立了案，对杨西光“隔离审查”。正如王少庸1978年在《我的认罪书》中供认的：“对杨西光同志的历史立案审查，更无根据。”杨西光被非法监禁、迫害长达七年之久，身心上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尽管如此，他始终坚持原则，不说假话，保护同志。直到1974年2月23日，杨西光才获得“解放”。

宋季文和李干成两位原上海市领导，是我父亲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老部下。“文革”中，他们拒绝与“四人帮”同流合污，与我母亲一起关押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同样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位于浦西曹河泾，这里先后关押了两百多名上海的重要干部和知名人士。1967年底，张春桥、王少庸、王承龙等要上海有关部门找一个秘密关押受隔离审查的领导干部的地方，要求“安全”、“近郊”、“与居民隔绝”、“既不象监狱，又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后来就选中了这里。

宋季文曾与我父亲共同战斗与工作了数十年。抗日战争期间，宋季文在苏中根据地协助我父亲开展后勤保障工作，曾任苏中四分区税务局局长、新四军第一师供给部部长、苏中三分区财政经济处处长、苏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和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解放战争期间历任苏中根据地财政处处长、苏北军区供给部部长、苏北兵团供给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后勤部部长等职。建国后，宋季文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委副主任、财办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56年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兼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

在上海工作期间，宋季文一直看不惯张春桥那付阴阳怪气的嘴脸，两人“文革”前还因工作上的事争论过几次。对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背着上海市委大搞“两面派”的卑劣行径，宋季文气愤难当，批评张春桥的言辞最激烈。“安亭事件”发生后，在那次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为“炮打中央文革”、“围剿张春桥的反革命事件”的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宋季文质问张春桥：“现要工厂里许多人纷纷责问市委，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为什么要签字？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指示精神？是否符合主席思想？是否符合十六条？问题提得很尖锐。群众要求开万人大会，声讨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采取革命行动，捣毁造反司令部，说要找张春桥辩论……”张春桥后来还到我父亲那里去告宋季文的“黑状”，我父亲未予理睬。

“文革”一开始，宋季文料到张春桥会借机报复自己，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他年轻时就喜爱诗词，不同时期写下了不少作品。“鉴于历史上的文字祸，恐招是非，遂一火焚光。”在劫难

逃的宋季文竟被张春桥一伙人关押了5年之久，受到了各种非人的折磨。为纪念关押地曹溪路少教所，他将自己的诗集取名为《梦溪诗词集》，记叙他在“隔离”期间的遭遇。

按规定，宋季文晚上9时才能睡觉，有一天他体力不支，晚上8时就坐在床上闭目休息，被造反派瞧见，就打开房门质问他为什么提前睡觉。宋季文反问造反派：“坐着怎么能算睡觉？”与他们大吵了一场。还有的造反派以趁宋季文出去放风之机，偷拿他的香烟，偷窃行为持续长达一年之久。宋季文被迫向上反映此事，也招到报复，此后不给他看病，不让他吃饱饭。他便写下了一首《病中有感》：

有病无医病自多，寒冬苦冷可如何？耳鸣不是阳春曲，腹叫犹如下俚歌。黑犬隔墙空吠影，黄牛浮水自过河。

过春节不让理发，也是“四人帮”死党折磨、污辱受关押老干部的一种刑罚。宋季文的记述是：

己去春光何处觅，终日无言，独自窗前立。忽觉今宵是除夕，长须长发惊如雪。

还有一次，宋季文因久居牢房，渴望重见天日，思念亲人，偶然长叹两声，被造反派听到了。造反派打开房门，同宋季文大吵一场。宋季文气愤之极，填了一首词《鹧鸪天？无题》，描述了自己的境况：

紧闭牢门又一春，铁窗风味总关情。无端小子来寻衅，不许长叹一两声。颠狂甚，无亲人。只能夜夜伴孤灯，卧床空听潇潇雨，欲取门锤斗鼠群。

宋季文先是被监禁在少教所里，后来又被赶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受难期间，宋季文始终同丑恶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老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一腔报国之志。如他所言：“心中自有千重恨，头上徒增两鬓霜。烈士暮年情尚烈，老骥伏枥愿途长。”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2年，宋季文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顾问，跟朱镕基在一起工作。他们相处共事，关系甚好。1996年，宋季文因病去世。朱镕基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纪念他：“忠贞不渝，刚直不阿，清正廉明，诲我良多。”

李干成也是一位铁骨铮铮、令人敬佩的上海老一辈革命家。1929年，李干成在上海建设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转为共产党员，并于当年冬季辍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上海闸北区团委宣传部长。从1930年开始，李干成先后担任中共宿迁县委、邳县委书记，共青团徐海蚌特委、吴淞区委、沪西区委书记等职。1931年，李干成在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期间，到上海开会，因叛徒出卖，全部参会者被国民党反动派一网打尽。李干成后被判刑六年，关押在苏州陆军监狱。“八一三”淞沪抗战暴发后，苏州面临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危险。国民党陆军监狱将在押的政治犯全部无条件释放。李干成出狱后，回到家乡江苏涟水，成立抗日同盟会和地方抗日武装，历任抗日同盟会理事长、抗日义勇队队长、八路军南进支队第八团政治部主任。1940年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他又相继担任淮海行政公署民政处长兼粮食处长，中共泗沭县委、宿迁县委书记，淮海地委组织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李干成先后担任淮海区第二中心县委书记、华中支前司令部副政委等职。1953年，担任苏南区常州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的李干成调到上海，先后担任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交通工作部部长，基建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62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在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数十年。

“文革”初期，张春桥一伙考虑“三结合”问题，曾经想拉拢李干成与马天水、王少庸一道上他们的贼船，条件是必须揭发陈丕显和曹荻秋“三反言行”。李干成严辞拒绝，随即被打倒，长期关押在少教所。专案组人员抓住李干成1931年被捕问题大做文章，对他进行疯狂批斗和审讯，逼其承认是“叛徒”。李干成的这段历史问题，1941年在华东整风运动中已作出明确结论，并恢复了他的党籍。而审讯人员仍不放过他，采取了“车轮战”、“蘑菇战”。倔犟的李干成毫不屈服，直到被折磨得中风倒下，神智不清达20多天，报了病危。李干成在少教所关押期间，还患上了肺结核，不得不入院治疗。直到1974年，李干成才得以重见天日。

说起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上海老一辈，我还要介绍一下我父亲的老朋友，原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悲惨遭遇。

陶勇叔叔是我军历史上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许多著名的战役都留下了他的英名，如黄桥决战、苏中七战七捷、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以及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等。他与我父亲在抗战初期就认识了，当时我父亲在苏中区党委，他在第四分区，两个人在工作中有很多接触，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结下了生死之交。

陶勇叔叔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在1965年海军党委会议上，当林彪一伙开始暴露分裂海军党委、篡夺海军领导权的阴谋诡计时，陶勇拍案而起，愤然离席，并向贺龙元帅报告了有关情况。在中央军委和叶帅的领导下，陶勇与林彪及其死党作了坚决的斗争。1966年7月，中央军委在北京讨论了海军的斗争问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指出林彪的死党是“搞地下活动，是想黄袍加身”。会议期间，陶勇应叶帅之邀到会，痛斥林彪的一伙死党说：“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利益、党的原则？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林彪死党的夺权阴谋破产了，迫使林彪不得不走到前台，公开干预，亲手扶植其死党上台。

1966年底，叶帅打电话给我父亲，要父亲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提醒陶勇警惕。陶勇当时还患有严重的胃病。许世友专程到上海看他时，对他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可陶勇仍然坚持说：“我要在这里顶着。”“一月风暴”袭来时，上海陷入空前的混乱。1月21日，陶勇对家人说：“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了不起，它和党的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近来有很多事情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有了这两点，就什么也不怕了。”可就在当天下午却发生了“陶勇自杀事件”，陶勇被发现死在东海舰队司令部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米的浇花井里，头上还有着明显的硬伤和瘀血。陶勇遇害不到四个小时，林彪一伙就盗用海军党委的名义作出了陶勇是“叛徒”的结论。他们指使暴徒破坏出事现场，把陶勇的遗体拖在地上，倒上墨汁，戴上高帽，在脸上打上×。他们还准备抬尸游街，因引起了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强烈愤慨，才不得不作罢。几天后，陶勇的尸体被恶毒地以“亲属不看，骨灰不要”的方式处理了。

陶勇遇害的当晚，一伙暴徒闯进陶家，向朱岚阿姨及孩子们宣布了“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的消息，并看管他们不准离开家。朱岚阿姨愤怒地对看守呼喊：“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自杀！”“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交出杀人凶手！”……连续三天，陶家被造反派反复查抄洗劫。1月24日晚，家中又来了一卡车暴徒。此时，朱岚阿姨已三天水米未进，神志恍惚。暴徒们要她跪下，她轻蔑地摆了摆手，说道：“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跪下？！有罪的是你们——杀人的刽子手！”话音未落，朱岚阿姨就被几个人强行摁倒在茶几上。一个家伙吼道：“你是叛徒的老婆！”朱岚阿姨针锋相对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那个家伙威胁朱岚阿姨喊“打倒陶勇”，她就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站在一旁的孩子们也跟着妈妈呼喊“共产党万岁”。暴徒们恼羞成怒，立即对朱岚阿姨一顿拳打脚踢，致使她昏死过去，从茶几上摔下来。可没等朱岚阿姨完全苏醒过来，暴徒们又把她拖上茶几，继续殴打、审讯……

朱岚阿姨对女儿说过：“我等着党和人民为你爸爸申冤的一天，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斗下去！”她到处为夫申冤，同时经受着一次比一次更为残酷的迫害。1967年8月的一天，朱岚阿姨突然被秘密关押起来，罪名是“日本特务”。审讯人员还要她交待陶勇的所谓罪行，以及陶勇与周总理、叶帅的关系。朱岚阿姨严词拒绝，坚贞不屈，受到轮番围斗和拷打。棍棒、竹板打断了好几根，被打断了肋骨，遍体鳞伤，没过多久便被折磨致死。

张春桥获知朱岚已死后，恶狠狠地对东海舰队的死党说：“人死了，灭了口，线断了。”尽管如此，林彪、“四人帮”一伙仍借陶勇之死，策划了一个以死人整活人的阴谋，先后整理了三十多个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黑材料，几百人因此受到株连蒙冤。

我父亲直到结束了八年囚禁生活后，才得知老战友陶勇夫妇去世的消息，顿时心痛如绞。他坚定地认为，陶勇决不是自杀，他与在“文革”中无数被害的同志一样，死于一小撮阴谋家之手，而林彪、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就是罪魁祸首！

“文化大革命”尤其是上海的“一月风暴”，把我父亲、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李干成、宋季文、陶勇等老一辈抛到了风口浪尖。这既是他们最凄惨、最悲壮的人生时刻，也是他们最英勇、最辉煌的人生时刻。在黑风浊浪中，他们同仇敌忾，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曲令人回肠荡气的抗争之歌。

~~~~~

## 【百家争鸣】

###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一些不同意见

• 高 原 •

麦克法夸尔是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文革史的领军人物。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所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按丁学良的说法，“本书是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英文、中文的少数通史和大量的‘切片分析’，可以从它的英文版近200页的注释和文献索引（占全书篇幅的几乎四分之一）中看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便体现了麦克法夸尔的治学基调：它首先是一部编年史，力求把十年文革的最重要事件整理出头绪；它同时也是一部诠释史，力求对文革这部政治剧中最重要的演员（agents）——不论他们是得胜者还是失败者——行动的动机，给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解释。”（丁学良：《四十年研磨出这部著作》，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承蒙该书中文译本简体字版出版人魏承思先生厚爱，赠书一册。研读之后，获益匪浅。同时，又觉得书中某些提法尚值得仔细推敲。现将敝人对该书第一章“第一轮排炮”、第二章“围攻北京市委”中的一些不同意见或某些瑕疵处罗列如下，以就教于诸方家。

一、“江青多年来一直为自己不能对文化政策施加影响而感到灰心丧气。1939年她在延安与毛结婚的时候，就蒙上了破坏毛婚姻的恶名。毛原来的妻子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英雄，陪伴毛走过了漫漫长征路。毛的高级同事们坚持要求江青只负责照顾主席的生活，不让她过问政事达25年至30年之久。到1960年代中期，这个禁令已经快到期了。”（页15）

以上第一句话，对江青性格的把握并不准确。江青性格极为反叛、倔强，在逆境中不会“灰心丧气”反倒会激发斗志。江青与毛泽东结合是在1938年而非1939年。不让江青过问

政事若干年的所谓“约法三章”，只是一种传闻而非事实。否定此种传闻的详细考证，可见阎长贵的《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约法三章”的问题》（《问史求信集》页265—274）。事实上，江青在建国前转战陕北期间即担任过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建国之初，曾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当时中宣部的处高于现今的司局级），后又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称中办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这是一个相当于副部级的职务。

江青自己说过：“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江青：《为人民立新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

二、“江青对政治地位不断增大的兴趣也许和主席对她不断减小的兴趣有关系。他们两人经常分开。毛一直以来喜欢与一群年轻貌美的女性跳舞和调情。她们通常来自文工团。其中有的人成为了他的家庭成员。”（页15—16）

第一句话的判断并不正确，政治与性事有此反比的关系吗？相反，江青政治地位的上升，恰恰与毛的扶持休戚相关。从“京剧革命”到批《海瑞罢官》，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五一六通知”，江青都是为毛作前驱。

后几句话，出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轻信这本书，将其部分章节作为正史来引用，是危险的。譬如，如有读者问，谁“成为了他的家庭成员”？作者该如何作答呢？总之，整段话使人有将一场政治斗争矮化为“后妃争宠”的感觉。

三、“然而，这篇文章原本可以不让它发表的。柯庆施死后，如果党的纪律得到遵守的话，江青在上海的活动就会被打断。陈丕显继柯之后担任上海第一书记，他是当地一个受人尊敬的党的官员，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也许是因为柯不信任他。张和姚为向新任领导隐瞒自己的行动而感到不安，于是江青征求了陈的同意。……江青解释了自己的行动背景，要求陈允许张春桥和姚文元继续协助她工作。并要求他保密，尤其是不能让北京的党组织知道。这时的陈也许考虑到了上述一层因素，但更有可能的是，江青揭示了毛对这一行动的重视，于是陈决定不顾向上级组织汇报的纪律。……陈的失职让他的上级在毛的密谋面前解除了戒备。”（页18—19）

作者在这里主要使用的，是《陈丕显回忆录》的说法。类似回忆录，多经一个秘书班子修订，官方同意后出版，是所有史料中最不可靠的一种。陈丕显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责任全部加诸于柯庆施头上，恐有违事实。

作者已经知道，江青是1965年2月底才为《海瑞罢官》一事到上海的。而“据柯六六回忆，柯于1964年3月即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经医生确诊为肺癌。4月，在华东医院动手术。7月，离上海赴北戴河疗养。9—10月间，在北京休息。1965年初，到广州疗养。原计划疗养一段后即回上海工作，惟周恩来电示柯须安心养病，不必急于返沪。3月，转往成都继续疗养。4月9日，因胰腺炎突发病逝于成都。

“陈丕显与柯六六两人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的是：柯庆施早于1964年初已因重病而脱离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日常工作，年中即到外地疗养，自此未能回沪。而‘1965年春节刚过’再次到沪的江青，并无可能与柯在上海见面（目前也没有材料证实江青到上海前曾在外地见过柯）。江青后来多次称柯对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很支持，今天看来，类似如此这般说

法，目的不过也就是打着柯庆施的旗号，以争取华东方面的更大支持。

“上海老一辈学者邓伟志先生对柯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作过一番调查。据邓称，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后来说：‘姚文与柯老没有关系’。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也说，姚文‘与柯庆施毫无关系’。另‘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余汝信：《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对〈陈丕显回忆录〉的若干质疑》）

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指的就是陈丕显等。此外，作者两处提到了陈的“上级”。谁是陈的上级？难道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不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上级？

四、“《文汇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要求彭真的喉舌——《北京日报》的总编辑组织一些反馈文章。该总编辑询问她的顶头上司、彭负责宣传的得力干将，‘我给他讲一些什么呢？’回答是：‘你就说今天天气哈哈！’”（页19）

“今天天气哈哈”使这段话带有些演义的成份。“该总编辑”的“她”，指的应该是范瑾，她是《北京日报》的社长而非总编辑。事情的真相也应该是“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彭真在12月份批示邓拓组织人手撰文论证吴晗的错误是学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彭在上海和张春桥会面后，对这个措施增加了信心。张春桥断言这只是一场学术之争，并对争议的开展方式提出了建议，从而蒙骗了彭真。彭真接受了张春桥的建议，甚至答应在辩论走上正轨后请他吃北京烤鸭。”（页20）

彭真要请张春桥吃烤鸭，是陈丕显的说法，作者在这里又轻信了陈。实际上此时彭真已得知毛的真实意图。1965年12月22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前一天，毛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2月26—27日，“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六、“在接下来的8个月内，毛穿梭于上海以及长江下游的一些城市。在杭州，他下榻于西湖岸畔的刘庄，这是一处建于清朝的别墅，原主人是一位大茶商，占地达130英亩。”（页20）

这八个月里，毛主要住地是杭州、上海、武汉、长沙、韶山，后三者均不位于长江下游。

毛建国后在杭州的住地有两处。一是刘庄（原为晚清广东举人刘学询别墅），为1950年代住地。另一是汪庄（原为民初安徽茶商汪自新别业），1958年汪庄修葺为浙江省委第二招待所后，1960年代则成为毛的住地。此时，刘庄相当于杭州的钓鱼台，汪庄才是杭州的中南海。毛1965年到杭住的应该是汪庄（现称浙江西子宾馆）而不是刘庄（现称西湖国宾馆）。据随卫毛的张耀祠亦称：“1965年10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页28。不过张所述时间有误，应为1965年11月）

七、“毛在打倒一个重要人物前先要除掉其副手，比如彭真案中的吴晗。林也仿效这一策略，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肖向荣。”（页 2 3）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的确确是毛的突破口，但吴晗远远称不上是彭真的副手。彭真在北京的副手是刘仁、郑天翔、万里。肖向荣也难以称得上是罗瑞卿的副手，罗的副手是杨成武、肖华。而杨、肖两人恰恰又是批罗的得力干将。

八、“罗在返回中越边境前，中途在上海、苏州稍作停留，11月27日，他告诉林，肖向荣一案已经做得过火，林彪不置可否，文革中毛在和他打算清洗的对象谈话时采用的也是这个策略。11月30日，林派妻子叶群去杭州，争取毛支持打倒那位总参谋长。”（页 2 4）

作者在这里主要是依据黄瑶的说法。而黄瑶的说法就那么可靠吗？如关于罗去苏州见林的时间，据《罗瑞卿传》：“11月27日，罗瑞卿在送走朗诺之后乘飞机赴苏州。”而据新华社讯，当天晚上罗在上海举行宴会，欢送朗诺率领的柬军事代表团，当日朗诺尚未离沪。“换言之，如果有罗到苏州见林彪这回事，那一天也只能是第二天，即11月28日。”（余汝信：《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的再研讨》，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三二期，2008年3月3日）

叶群去杭州见毛，到底是毛本人主动还是林主动？十分关键。这一问题，近年有与黄瑶的说法很不相同的意见。从当时情势分析，似应为毛主动的成份多一些。毛不主动，林应不会派自己的妻子去冒这个险。

九、“作为其丈夫办公室主任，叶群积极收集罗的黑材料。叶群本人是解放军的一名上校，1950年代后期肖向荣拒绝提拔她，导致她对肖向荣和罗瑞卿都很不满意。她的世界史私人老师说她注意力不集中（‘她很难集中精力’），她丈夫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都不喜欢她（一位秘书说：‘大家都认为叶群很坏’）。她在政治上野心勃勃，那些在她没有嫁给林彪以前就在延安认识她的人认为她很轻浮。”（页 2 4）

所谓红颜祸水，作者似乎也难以离得开这一俗套。况且，叶群政治上是否有这么巨大的能量，肖向荣和罗瑞卿的倒霉，以作者的思路推断下去，起因竟然都是这位女士的“很不满意”？！

今天，要恢复叶群的本来面目，很不容易。如延安时代，据林豆豆讲，叶与林的结合，其实是毛、朱撮合的，叶群当时并不很愿意。（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页151）

十、“林在信中解释道，这些‘重要情况’是‘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有关情况是叶剑英元帅刚刚告诉我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页 2 4）

上海会议印发的十一份材料里，林彪致毛泽东的信中并没有括号中“有关情况是叶剑英元帅刚刚告诉我的”这一句话。作者注明是出自王年一手稿，而王的出处又何在？有些疑问。对叶剑英，林彪一般不会这样称呼，尤其是当时已取消了军衔。

十一、“叶群单独和毛进行了7个小时的谈话”（页 2 4）

这是从《罗瑞卿传》“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引申出来的。据张耀祠称，他告诉叶群毛还没有睡觉，“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经多次催促，叶与毛最后还是谈了“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张耀祠回忆毛泽东》，页 3 0）

这样不太靠谱的谈了多少时间的具体细节，严肃的史学著作还是不要坐实了为好。

十二、“对罗的控诉主要是叶群进行的，她讲了3次，时间长达10小时。林彪本人、李作鹏和吴法宪中将发言支持，后两者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在林的庇护下，李和吴稳步晋升，他们都盲目地忠于林彪。1971年林身败名裂后，海军政委李作鹏承认：“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空军司令吴法宪这样交待他和林彪的关系：“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会上传阅了叶群呈给毛的材料。这些材料没有说服政治局的高级成员们。”（页26—27）

林彪并没有出席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李作鹏在会议上未有发言（也轮不到他发言）。而1971年后所谓李作鹏的“承认”和吴法宪的“交待”，更带有浓烈的演义色彩，他们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

会议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2、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3、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4、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5、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6、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7、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8、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9、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10、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11、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上海会议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成员对会议材料是否内心存疑，有没有被说服，外人如何能以揣测得知？而毛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谅他们也不敢有任何公开的不同意见。

十三、“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没有达成如何处理罗的结论。这样的迟疑反映了普遍的不安情绪，这个案子针对的是一位佩带四颗将星的参加了长征的老战士，依据的只是一位上校的脆弱的证词，而且这位上校还是一个女流之辈——而中共是搞家长制的——她不是中央委员，她的军衔也许只归因是元帅的妻子。”（页27）

据王任重日记，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00）

这些意见，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阶段性的结论。顺便说一句，本书多处提及了军人们1965年中已经撤销了的军衔，应无必要。这些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已不起任何作用。

十四、“1966年1月，叶剑英元帅取代罗任军委秘书长。”（页28）

事实上是，1966年1月8日，叶剑英与陈毅、刘伯承、徐向前一道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兼任军委秘书长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

十五、“从3月4日到4月8日，在邓小平、彭真、叶剑英的共同主持下，来自军队不同部门的42名高级干部开会批判罗。”（页27）

邓、彭只是开了个头，以后的会议实际上由叶剑英主持。第一阶段参加的军队和公安部负

责人共42人，第二阶段增加了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队方面负责人53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95人。

十六、“关是写作反对苏联的‘九评’文章班子的成员，……戚本禹比关年轻13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一个科长。1963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了有关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起义的正统观点，得到了毛的首肯，……1966年初，关和戚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理论刊物《红旗》，关任副总编辑，戚任历史组组长。”（页30）

关锋并不是“九评”写作班子的成员。戚本禹当年是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毛泽东的秘书班子）科长，1963年发表《评李秀成自述》，指李秀成自述是“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忠王不忠”，“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1964年夏，在陈伯达要求下到《红旗》负责历史组工作。关锋则早于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时即任编委，任《红旗》副总编辑是在1966年5月。同月，戚本禹调回中央办公厅工作，是年夏天挂名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

十七、“严慰冰在其丈夫的机关中多年担任一个部门的副局长。……叶群在1966年初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这些恶意中伤的信件的作者，决定就此大做文章。”（页36）

严慰冰是其丈夫陆定一的秘书。

严慰冰案侦破的时间，不是1966年初，亦与叶群无关。据刘少奇称：“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之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哪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7日）

刘少奇的说法应比较可信。

十八、“在会议听取陆的检讨的那天，每一位与会者都在自己的椅子上发现林彪一份手写便条复印件。这是政治局会议收到的最离奇的声明之一，它说明领导层此时的‘政治斗争’恶化到了何等低级的层次，其全文如下：

我证明（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延安处决的一位作家）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林彪，1966年5月14日。”（页36）

这个离奇的故事，有数个版本。最早的版本，应是黑雁男（即原空政文艺创作室主任丁一三）发表于1985年的“长篇报告小说”《十年动乱》（载《人世间》第1期（创刊号）），除个别标点符号及没有（延安处决的一位作家）这一注解外，与上文相同。请注意，黑雁男是位作家，《十年动乱》是小说，是文学作品。

金春明发表于1990年代的《大冤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载《红岩春秋》1993年第1期）及《“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引用了与黑雁男大同小异的“林彪证明”（第（二）点与黑文的小异是“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金以严谨著称，但在上述著述中，金并未注明“林彪证明”的出处。

刘志坚的版本是：5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陆定一，“20日会前在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写的复印件：‘叶群是处女。林彪’。散会时由工作人员收走。”（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页241—242）

王年一的《大动乱年代》，引用了与刘志坚相同的说法，并注明：“此处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刘志坚的回忆”。（《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页18）王年一接下来在注解中同时又列入了黑雁男的说法，似乎是表明他相信刘志坚的“回忆”而没有采信黑雁男的。但刘志坚在回忆中其实已说明他仅在5月11日至18日列席了会议，换言之，5月20日的会议他并未参加。

李雪峰的版本是5月11日，“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的纯洁的处女之类的话，说严慰冰的揭发信全属造谣。”“很快文件就回收了”。（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本来，所谓林彪手写便条复印件（当时中央办公厅是否有复印的技术条件？就很有疑问），演义成份就居多，又有这么多个不同版本，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严肃的史学著作应以慎重的态度对待之，以不载入为好。如果要客观阐述这一段历史，不如直接引用、分析一下中共的正式文件《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的说明》更保险一些。

十九、“中共中央办公厅前主任杨尚昆被召回北京，最终得到了他被撤职的理由：在毛主席的住所安装窃听器，泄露党的机密，与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下常’，并犯有‘其他的严重错误’。这种指控没有提供什么证据。”（页37）

据《杨尚昆回忆录》附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杨尚昆5月5日由上海回广州。5月22日，陶铸、赵紫阳在广州向杨传达中央停止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免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的决定。5月30日，离开广州去山西改任临汾地委副书记。换言之，杨5月5日至30日一直在广州，并未被召回北京。

杨在1965年10月29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约见谈话时已知道其被免职的原因。杨的日记记载，10月30日，“下午同曾三同志（注：中办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谈了档案馆的问题。失密问题如何处理，过去我虽然抓了这件事，但终于出了大问题。曾对此缺乏重视。”（《杨尚昆日记》，页682）当时，还没有提及“窃听器”问题。

二十、“政治局在会议期间发布了6份中央文件，阐述了清洗彭、罗、陆、杨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页40）

实际上涉及彭、陆、罗、杨和发动文革的是四份中央文件：

- 1、中发（66）267号《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含六个附件，5月19日发出；
- 2、中发（66）268号《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含六个附件，5月25日发出；
- 3、中发（66）277号《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5月27日发出；
- 4、中发（66）278号，中央关于“望即依照下达”《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通知。5月27日发出。

二十一、“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编定的大事记”（页41）



《大事记》应该是康生主持编定的。据王力称，“大事记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专门搞大事记的人。他把毛主席历次谈阶级斗争的话都排起来，这次又排了个大事记。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了刘邓同意，我是参加整理，还有李鑫、贾一学。”（《王力反思录》下，页600）

二十二、“《五一六通知》和关于罗瑞卿的‘错误’问题报告一样那时在中共内属于机密，只有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在5月17日政治局仍在开会的时候研读这份文件。”（页42）

《通知》落款日期虽然是5月16日，但它5月19日才由中办机要室发出。

二十三、“6月，彭真手下的所有10名副市长（包括吴晗在内）都丢掉了工作。”（页44）

文革前夕，北京市只有八名副市长，按排名先后是：万里、吴晗、王昆仑、赵凡、范瑾、王纯、崔月犁、乐松生。

二十四、“毛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在大跃进饥荒期间提倡部分取消集体化，从而失去了主席的信任，5月23日，他被扣上了‘伪造’主席讲话、阻止批判吴晗的罪名，也自杀身亡。……7月23日，《二月提纲》的两名主要执笔人之一，在被康生的秘书斥责为彭真专门派来监视康生的‘特务’后，上吊自杀。”（页45）

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1965年12月杭州谈话时有意删去了《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段，他的罪名是“篡改”而不是“伪造”毛的讲话。

后者指姚臻，他被诬为“中宣部派来钓鱼台写作组的特务”，于是1966年5月9日晚自杀身亡。

二十五、“李雪峰同陶铸一道得到提升，取代彭真成为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但是，李没有完成控制首都北京、让毛完全满意的艰巨任务，年底就去了显然要逊色一筹的港口城市天津，担任那里的市委领导职务。”（页46）

1967年1月，天津改为直辖市，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的是解学恭。李雪峰并没有在天津任职，据吴德的说法，是“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吴德：《十年风雨纪事》页21）

二十六、“陶、李、叶得到提升后，又对自己的亲信加以提拔或进行他们孜孜以求的调动。陶铸的情况完美地阐释了中国一句自汉朝就有的俗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名官员升了上去，其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跟着爬了上去。……把中南局秘书长任命为李雪峰的北京新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页46）

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垮了以后，就要往里补充人。当时除李雪峰外，从东北调了吴德；国务院调了高扬文、郭影秋、丁国钰；华东调了刘和赓、王一平（刘、王未到职）；华北调了池必卿（未到职）、马力，中南调了刘建勋、雍文涛。人都是中央调的，与李雪峰、陶铸恐怕没有多大关系。另雍文涛曾经担任过中南局秘书长，但1965年2月已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二十七、“‘首都工作组’由中央军委新任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担任领导。叶的副手是代总参

谋长杨成武将军、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将军。该工作组成员包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北京军区的两位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主任，中共华北局的书记。”（页50）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的组成人员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后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军委副秘书长兼代总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总政副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5月后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办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北京军区两位副司令员（其中傅在5月后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及华北局的各一位书记。”（余汝信：《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载《枫华园》第436期，2004年2月6日）

国务院秘书长指周荣鑫，而国务院秘书厅主任是杨放之。

二十八、“1966年6月，‘首都工作组’把公安部队在北京的两个武装警卫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工作组接下来大力充实了北京卫戍区，从1个师、1个团扩充到了3个师、1个团，很快又发展到了4个师，每个师下辖6个团，再加上1个独立团，再加上许多其它部队。两个新增的解放军主力师即70师和189师，都是从河北省调来的，与杨成武都有历史联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遇有紧急情况有权调动邻近地区的3个师。他直接向军委负责，也就是说首先向毛和林彪负责，而不是向所在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负责。”（页51）

以上说法大都根据《傅崇碧回忆录》，实际上不大准确。据有关组织沿革史，1962年军委办公会议曾考虑撤销北京卫戍区，故而，1966年2月前，除一直属警通连外，北京卫戍区并没有成建制的部队。1966年2月，组建卫戍区独立团（该团成立之初有向大学借房子作临时营房的设想，文革中被不明真相的学生诬指为“二月兵变”）。1966年5月27日，军委命令加强首都警卫力量，将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和第63军第189师调归卫戍区建制领导。6月15日，军委命令将第24军第70师调归卫戍区建制领导。至此，卫戍区有四个师，一个独立团，并没有“再加上许多其它部队”。其中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分别改称警卫一师、二师，各辖五个团，189师辖五个团，70师辖六个团，并非“每个师下辖6个团”。所谓“遇有紧急情况有权调动邻近地区的3个师”，是指1971年“九一三”时的情况（吴德说是六个师，这一说法，未经组织沿革史证实），并不是1966年的情况。关于卫戍区的指挥权，6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重申，必须集中于首都工作组，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和指挥使用，都必须经首都工作组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并不是“直接向军委负责”。

□ 原载《记忆》第55期 2010年8月15日

~~~~~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十八）

• 舒 云 •

93、谁是毛泽东安插在林立果身边的“眼线”？

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是从什么渠道打听到的？是故意泄露？还是林立果真有“眼线”？毛泽东离开上海，王维国电话告诉了林立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准备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专列就没有在济南

停更长时间，直接“杀”回北京。

毛泽东返回北京极其机密。那么，谁能知道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了呢？除了毛泽东身边的人，别人不可能知道，林立果也不会例外，借给他三头六臂他也不可能知道。9月12日下午，林立果曾打电话给留守毛家湾的8341部队二大队值班员，说给他烧洗澡水，他要回毛家湾洗澡。那时家里很少有澡堂，烧热水也是一大难事，所以林立果洗澡大都是回毛家湾，但要提前通知烧澡水。16时左右，林立果回到毛家湾洗澡。9月13日凌晨1时左右，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突然打电话给毛家湾，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从梦中惊醒。张耀祠劈头就问：林立果在毛家湾吗？蒋廷贵说在，张耀祠问：是在吗？！蒋廷贵说，是在啊，他下午要洗澡，让我们给烧洗澡水。张耀祠说：不对，你去看看。蒋廷贵有些犹豫，以前从来不到保卫对象家中，尤其是半夜，怎么可以进首长家中看呢？张耀非常果断地说：叫你去看看，你就去看看，怕什么？快点。蒋廷贵说是，立即到值班室，值班员说，林立果下午洗完澡就走了，一直没回来。张耀祠听后说，人家都跑了。我命令你，立即进入一级战备。……

如此这般，林立果下午还从容洗澡，肯定是得到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才紧张起来的。那9月12日下午，是谁向林立果报告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呢？当时并没有人因密告毛泽东行踪而当成林彪死党被关押，并且至今没有见到媒体披露。这个不太正常，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局外人不可能知道，如果毛泽东身边的人把毛泽东回北京的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呢？是毛泽东故意把秘密回到北京的消息透露给林立果，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林立果“跳”起来？

毛泽东真正紧张是9月8日在杭州，而这时正是林立果从北戴河坐飞机到达北京开始策划“两谋”的时间。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一“动作”，深夜毛泽东在杭州也“动作”了？把专列调离杭州。林立果计划南逃广州后，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汪东兴对上海虹桥机场油库的戒备等，决不是巧合，肯定有人通风报信。

林立果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他也非常注意保密，外人插不进脚。这说明在林立果这个小圈子里有“特务”，是谁？很多人也在怀疑。或许还不是一个。周宇驰、于新野肯定不是，因为他们那么坚决地自杀，说明他们是“铁杆”。林立果信任的左右手是周宇驰和刘沛丰。其他围在林立果身边的人就很难说了。是谁报告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有人说是程洪珍，直接通汪东兴。他用什么手段通知汪东兴？那时通信还不发达，电台没有，电话要通过总机才能要到杭州，他敢吗？写信更不敢。从程洪珍后来的境遇看，不太像。程洪珍精神不正常了，对象也吹了，只身一人回到老家，父母都已经去世，由兄嫂抚养。生活困苦，已经去世多年。这个深知林立果秘密的“眼线”不一定自己发报或打电话，他可以通过一个“组织”。那么是谁？

从毛泽东的行踪看，如果毛泽东没有“眼线”，他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知己知彼，一向是久经沙场的毛泽东的秘诀。要知道，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曾经做到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身边就有共产党的“眼线”，包括胡宗南、傅作义等国民党高官身边都有共产党的“眼线”，有的还不止一个，甚至能“冬眠”几十年。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还不算可怕，他没有掌握兵权。而林彪不仅军权在握，还把一儿一女都安插在空军，这不能不让毛泽东百倍提高警惕，他肯定会在林彪、叶群、林立果甚至林豆豆身边安插“眼线”。那时，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如同神一般，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除了“铁杆”，一般情况下都会倒向毛泽东，心甘情愿为毛泽东当“眼线”。

林立果等人要谋害的是毛泽东，不能公开进行。既要一些人供他们驱使，又不能让这些人了解底细，这是无法解脱的矛盾。林立果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迟迟定不下来，办法想了一大堆，

但哪一个都不行。事到临头，谁也不敢干。叶群一再催促动手，还专门给王飞打了“抽鞭子”的电话。毛泽东每年外出，都是在国庆节前才回来。林立果估计毛泽东要在9月23日、24日才能回到北京，所以并不是很着急。到9月11日，还没有商定。当夜，林立果接到上海王维国的电话，毛泽东离开了上海。他顿时大惊失色，痛哭流涕。但王维国不知道毛泽东什么时候到北京。

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不仅让林立果“跳”，还要“通知”他，让他更高地“跳”。

9 4、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怎么能是资敌罪？

毛泽东南巡时反复说，不能告诉北京。但是，毛泽东的本意是想完全封锁他的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不，他想让林彪知道，他太想让林彪知道了。因为林彪不知道，就不动。不动，就抓不住他的“辫子”。毛泽东一路上说了林彪那么多的“坏话”，字字句句，都是“大棒”，就是要激对方“跳墙”。按毛泽东的想法，“北戴河”只要知道了他南巡讲话，必然要跳起“三丈高”，决不会乖乖地把头伸到案板上等着挨宰。而传话与不传话，是毛泽东的试金石。毛泽东自信，他不让传话，还是有人会传话的。毛泽东的用意很明白，他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

可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南巡都20多天了，他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诸侯”们个个守口如瓶。“北戴河”死一般安静，“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毛泽东急了，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

那时，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圈子里知道高层分歧，甚至上了庐山的一些中央委员，都看不清庐山真面目。于是，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这在毛泽东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此举一箭三雕：既给林彪透个信，又可以发现“死党”，同时也给广州军区的高级干部打个“预防针”，别跟着林彪跑。

毛泽东南巡没有到广州，而是把广州军区的“诸侯”召到长沙。或许是因为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之后四野司令部就在广州组建了广州军区。所以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的威信非常高。林立果制定的方案中第二个方案就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张耀祠说：林彪搞了好久，我说了一次（指1971年8、9月间南巡谈话），广州军区开了个2000人的干部大会，林彪就不敢去了，只有往北走。11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9月5日，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了一个下午，晚上接着传达。规定了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毛泽东南巡讲话矛头直指林彪，广州军区师一级的干部都传达了，却不准往北京传，不准林彪本人知道，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一种策略？反正是欲擒故纵。如此一来，怎么可能对林彪保得住密？毛泽东就不相信，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中就没有人“胆大包天”？

果然，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他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纸上偷偷记了几笔，回家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电话，约定传达完后把情况传到北京。23时35分，于新野打来电话，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并说了他的疑问。除主席提到

副主席（林彪）外，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元都没有提到林彪。在那种时候，毛林不可分，怎么就分了呢？我想到，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确实，涉及到林彪的内容，刘兴元在传达时有所保留，但这也够厉害的。顾同舟没有当面“聆听”，而林立果听的是传达的传达，总还是要争取最“原始”。周宇驰对顾同舟表示嘉奖，说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林（立果）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连夜整理出几十页的材料，并附一封信，让自己妻子坐飞机送到北京。原定9月6日到广西桂林的周宇驰，马上改变计划，下午，他在直五机组的保驾下，驾着直升机，和于新野飞往北戴河。

毛泽东南巡第一站选择了武汉。8月16日，毛泽东刚到武汉，就在专列上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到毛泽东离开武汉，与刘丰谈了三次，矛头直指林彪。毛泽东本意是指望刘丰向林彪密报，没想到刘丰遵守“纪律”，老老实实地把毛泽东的狠话都咽到了肚子里。9月6日，副总参谋长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到武汉，刘丰忍不住了，吞吞吐吐说了几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李作鹏觉得应该向总参谋长黄永胜通通气，所以当天回到北京，李作鹏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作了汇报。黄永胜是李作鹏的上级，通通气总比毛泽东南巡说了一路更“理直气壮”吧？所以审理“两案”时李作鹏在这件事上没有罪。黄永胜马上用电话报给叶群，黄永胜的判决书上有一笔，罪名和顾同舟一样。刘丰虽然没上军事法庭，但也没逃掉严厉惩罚。

顾同舟哪里能想到，传话也传出罪来了。他被扣上“资敌罪”的帽子，九一三事件后就被抓了起来。1980年判了11年刑。顾同舟想不通，既然你对林彪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谈？林彪几次想见你，你不见，反而到处散布林彪不来见你，在背后说林彪坏话，这符合组织原则吗？你高高在上，平安无事，而我顾同舟只是传了几句话，又没有造谣。更何况林彪那时也没有被宣布为敌人，而是你的亲密战友、党中央副主席，我怎么就成了“资敌罪”呢？

95、1971年8月，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了7份，传达范围非常狭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汪东兴回忆：1970年庐山会议后，揪出了陈伯达。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毛主席南巡，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

毛泽东南巡是真想加强党的团结吗？《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指出：毛泽东尖锐地提出林彪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毛泽东晚年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坐专列外出巡视，返程一般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时，毛泽东开始最后一次南巡，历时29天，除个别谈话外，共谈话13次。毛泽东接见了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上海、江苏、北京等省市和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本来毛泽东还要找济南军区杨得志谈话，因他出差未果。参加谈话的名单如下：刘丰、刘建勋、王新、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白崇善、王洪文、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等20人。

8月16日，毛泽东到武昌，首先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又同刘丰、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调国务院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又与刘丰谈话。

8月28日，毛泽东到长沙，与华国锋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同广州军区刘兴元、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谈话，又同华、卜、刘、丁、韦集体谈话一次。

8月31日，毛泽东到南昌，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

9月3日，毛泽东到杭州，下车前，同浙江省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谈话40分钟。毛泽东在静候他讲话后的“回音”。

9月6日，北戴河得到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终于有动作了！

9月8日晚，毛泽东突然提出转移专列。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因为林立果他们提出轰炸毛的专列，汪东兴借口防晒，让在专列顶上搭一个棚子。

9月10日中午，毛泽东又突然提出到上海，随行的警卫部队措手不及。午饭前，战士与当地驻军打了一场篮球友谊赛，全身都汗透了。战士们打完球，洗了澡，洗了衣服，衣服还湿淋淋往下滴水。中队长陈长江命令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立即出发。临走毛泽东与南萍、陈励耘、白宗善谈话。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抵达杭州站。

18时10分，毛泽东专列到上海郊区虹桥机场专用线。毛泽东一反常态，没有下火车，而以前到上海，都要住在顾家花园，只有这次例外。汪东兴布置警卫，尤其是机场油库要放两个干部队的队员。虹桥机场油库距离专列只有150米，因为林立果他们提出了炸虹桥机场的油库。当晚，没有找到许世友，毛泽东只与上海市负责人王洪文谈了几句。

9月11日近中午，许世友坐值班飞机赶到上海，毛泽东与他和王洪文谈话两小时。之后毛泽东没有留他们吃饭，打发他们走后，毛泽东马上让发前卫车。毛泽东专列由三列火车组成，前卫车、后卫车和中间的主车。随卫的干部队100名队员分布在三个列车上，当然主车最多。

13时12分，毛泽东专列开动。

18时35分到南京，停15分钟。到蚌埠21时45分，停车5分。

9月12日零时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2时45分，到兖州，没有停车。

5时，到济南，停车50分。汪东兴布置张耀祠打电话，要中办值班室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泽东要与他们谈话。

7时40分，到德州，停车20分。

11时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

13时10分，到丰台。谈话到15时多。

15时36分，从丰台开出，16时5分到北京站。

1984年5月，汪东兴对访问者说：毛主席南巡时主要讲林彪的问题。……每次谈话我都参加了，每次都谈庐山会议，说这是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显然，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的问题作了十分严重的估量，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作了十分严重的评价，而且认为事情还没有完结。他这次到外地，没有告诉林彪，这是与过去的做法不一样的。在外地的谈话内容，不仅没有在中央会议上谈过，没有同林彪谈过，而且要求绝对保密。

毛泽东“周游列国”，会见“各方诸侯”，不仅点了黄吴叶李邱的名，还点了林彪。说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说过了头嘛。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毛泽东在杭州说，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

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作为党的主席，就能到处游说，搞掉党的惟一的副主席吗？毛泽东的所有谈话汪东兴都是陪者，甚至毛泽东还同汪东兴单独谈过一次。毛泽东南巡的所有谈话都是一边倒，除了毛泽东，别人都是听众。还是那句话，毛泽东背后猛烈抨击林彪和黄吴李邱，符合组织原则吗？毛泽东多次强调“三要三不要”，那么是谁在分裂我们的党？现在看，同意设国家主席，称天才就是反党纲领吗？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南巡，就不会有九一三事件。

（未完待续）

□ 选自 舒云_新浪博客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